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茅山道教志

杨世华 潘一德 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
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师范大学出版社

茅山道教志

杨世华 潘一德 编著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
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B959.2
Y1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B959.2
Y1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山道教志/杨世华,潘一德编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1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ISBN 978-7-5622-3518-7

I. 茅… II. ①杨… ②潘… III. 道教史—茅山 IV. 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7977 号

茅山道教志

编著:杨世华 潘一德 ©

责任编辑:沈继成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75 千字

插页:6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625

版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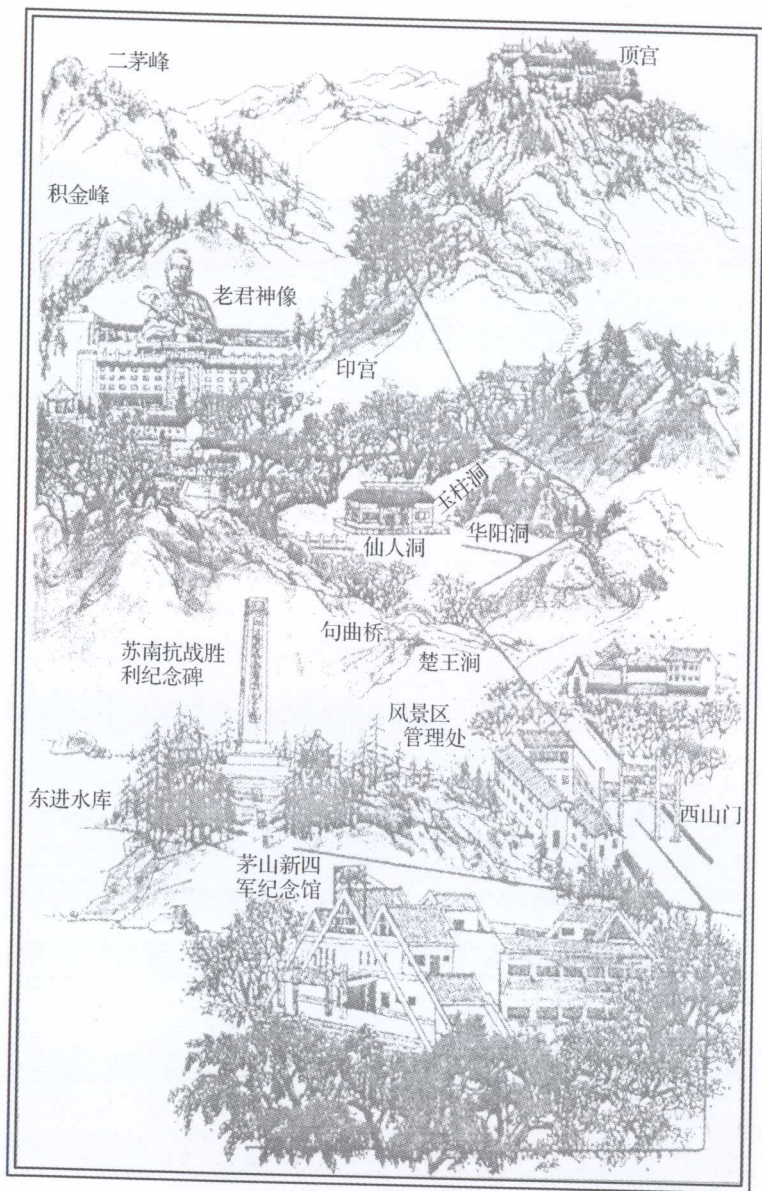
印次: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2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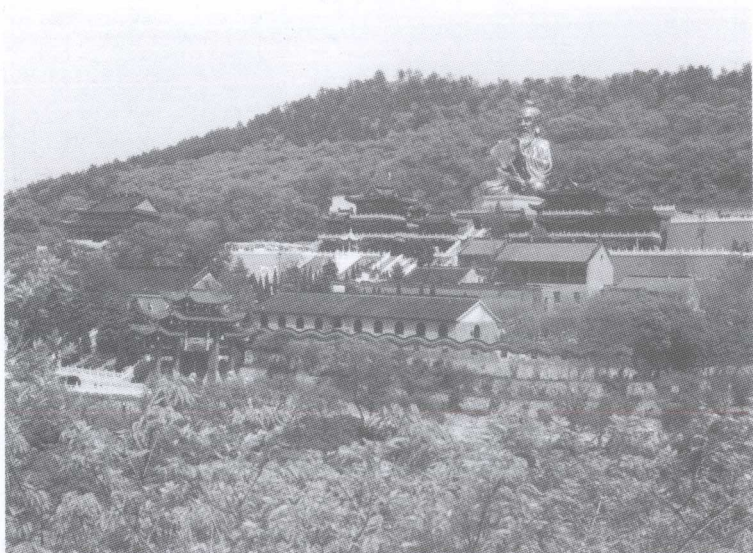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道教圣地、旅游胜地茅山旅游图



第八洞天第一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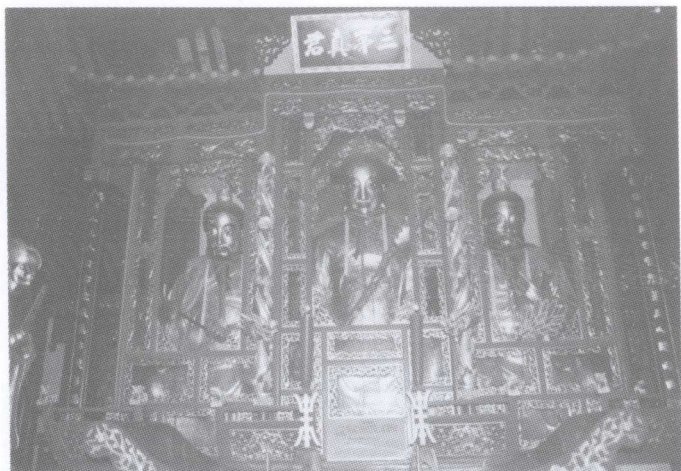
茅山元符宫全貌



茅山九霄宫全景



葛仙观三清宝殿



九霄宮三茅祖師



元符宮露天老君銅像



茅山镇山四宝(玉印、玉符、玉圭、呵砚)



茅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全体与会代表合影(2001年8月)



杨世华会长在2006年茅山葛洪与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上致辞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编委会

顾 问:陈鼓应 唐明邦 张继禹 黄胜得

主 任:熊铁基 杨世华

副主任:刘固盛(常务) 郑志平 冯可珠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金涛 王玉德 王 平 史新民

刘守华 刘韶军 何春生 陈建宪

范 军 胡 军 倪定胜 萧汉明

董恩林 潘一德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总 序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起了一股研究道家道教文化的热潮,至今仍可以说方兴未艾。这股研究热潮的兴起,一方面是有—批海内外学者(如王明、汤—介、陈鼓应、卿希泰等许多学者)的推动,另一方面又是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致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是否三足鼎立,似乎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除了佛教是“外来”的,儒、道二家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究竟谁的资格最老,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不过,儒、佛、道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则是毫无争议的。和儒、佛二家相比,道家以“道”为主要特点,名实相符,一目了然。但是,“道”字原本并非道家之“专利”,周秦诸子“道论”之作很多,汉以后的儒者讲“道统”、“原道”,也使用这个“道”字。到了宋代,从周敦颐、二程至朱熹—批被称为理学家的大儒,他们以儒家为主,兼容佛、道二家思想的某些内容,再—次改造儒学,被认为是继承道统之学。不过,儒家所论之道,其要旨在于重礼、乐、《诗》、《书》,实行王道之治,“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无论是目的或方法,都与道家、道教之“道”不同。至于佛教之用“道”,相对要简单些,“道”字在佛经中难得找到—个较确切的对应词,早在唐代译“道”为“菩提”抑或“末迦”就是争论过的问题,这里我们无法深究。从历史事实看,佛教在初传中土之时,曾借用过道家之“道”是可以肯定的,当时人们讲佛教,常常使用“佛道”、“释道”这样的词。宗密在《孟兰盆经疏下》中说:“佛教初传北方,呼僧为道士。”两晋南北朝时期,僧人被称为“道人”、“道士”的很多,佛教诵经礼拜之所乃至佛寺也被称为“道场”,甚至“道具”—词,开始也是指佛家用的器

物。这种情况,是一种表象的情况,理应与当时道教已产生并流行有关。一开始,人们祭祀黄老、浮图难分,而外来的佛教又特别需要努力与中土民情相结合。从魏晋到隋唐,道教日益成长,佛教越来越站稳脚跟,佛道之争愈演愈烈,围绕着“道”的争论也是很多的:一方面佛教不时诘难道教的“道”,另一方面有时又援用道教的“道”论,例如唐初因傅奕上言“废佛法事”,法琳奉命“陈对”,就曾用过“至道绝言”,且引老庄之言,但其目的却是“演涅槃”,“说般若”,还用“历史”证明关令尹之后“事佛不事道”。再者,佛教中“道”字的用法与含义多与道教不同,有时候“道”是菩提或涅槃的代名词;有时候“道”与“法”、“义理”、“因果”相联,如此之类例子颇多,不必详列。从上述情况看,佛教的“道”字,主要只是名词的借用以及相近梵言的意译,没有道家道教那样的深刻意义。

对于道家、道教来说,这个“道”字就有根本的、全面的、深刻的意义了。道家、道教离不开“道”,名实一致,“道”也在道家、道教思想文化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中国所特有的“道学”。

关于道家与道教,大家都习惯用了,也不必时时刻刻去定义它们。由于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很难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和许多学者一样,一直使用“道家道教文化”这样的词语,而对“道学”一词持谨慎态度。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正式打出了“道学”的旗帜,出版了《道学研究》专刊,不止一次地召开了道学研讨会。我在一次会上谈到了“道学”这个提法问题。过去之所以避免提“道学”,是因为关于“道学”的提法和理解,存在一些歧义,例如《宋史》的道学类传实际是大儒传,儒道难分怕引起误会;又如过去在生活中,“道学先生”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形容有些迂腐习气,《红楼梦》中的袭人就被晴雯说成是“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第64回)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和今后,人们不会再去清这些老账了。公开倡导作为道家道教文化的道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从历史上看,称道家之学为“道学”,也是渊源有自的,《隋书·经籍志》在子部记《老子》、《庄子》等道家著作之后写道:“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这是唐初人的记述,是当时人的一种对道家的看法,也是汉以后学者们看法的

总结和发展,是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我们从以上引文的前后叙述看更为清楚,关于道和道家的说明,既有黄老之言道的基本观点,也有儒家学者对道家的评判,这里就不详说了。但是,从以上引文及其所述对象看,凡是述老庄的,“言黄老”的,可以总称之为“道学”。从《隋志》记载看,除《老》、《庄》之外,包括《鬻子》、《抱朴子内篇》乃至《夷夏论》、《简文谈疏》、《广成子》等一些后起的道家著作,正所谓“道学众矣”。

《隋书·经籍志》似乎未明确把“道经符篆”列入“道学”,但并不能影响我们今日把道教文化(以各种“道经”为重要内容的文化)列入“道学”范围,如果要找点根据,葛洪时代人们已经把道教法术称为“道学”,其《神仙传·李仲甫》记载,李仲甫“少学道于王君”,“兼行遁甲,能步诀隐形”,有张生用匕首对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辈愚人,道学未得,而欲杀之,我宁得杀耶?’”此所谓“道学”,显然指的是“法术”、“道术”。则道教之各种法术,亦可称之为“道学”。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无论道家道教文化或者道学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主要的当有:

首先,关于《老子》、《庄子》的研究,我们称之为“老学”、“庄学”,或者老庄学,包括老子、庄子其人其书的再研究,历代对《老子》、《庄子》的改造和诠释,《老子》、《庄子》的现代价值,等等。《老子》、《庄子》的思想对诸子百家有很大的影响,《老子》、《庄子》及其注释在道教经典中分量不小,无论在道家或道教的研究中,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其次,关于黄老之学的研究。从前引《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看,当时的“道学”,原本即指“言黄老”之“道”而言,《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应该就是好黄老之学。对黄老之学的研究,学术界早就开始了,并且有较多的成果,但看法不完全一样,大家公认的是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而兼容他家。兼容,本是战国秦汉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趋势,问题是以什么为主。秦汉最为明显的是有以道家为主的兼容综合,和以儒家为主的兼容综合,前者我们称之为新道家,后者有人称之为新儒家(秦汉时期的新道家、新儒家,儒道二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还会继续有新的变化,可称之为魏晋新道家、宋明新儒学,乃至当代新儒家、当代新道家等等)。这样划分,是为

了对学术思想作进一步梳理和深入的研究,至于具体哪一些学派、学人、学说应如何归并,那是可以具体研讨的,并不是所有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思想都笼统称之为黄老之学,无法否定的大儒董仲舒,其思想显然也有综合性特征,人们甚至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出一些黄老思想,但黄老之学中绝不会包括董仲舒。黄老之学当然是有一定范围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主要言黄老之道的学人和学说。这些,可以也应该纳入道家、道教文化和道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其他道家诸子的研究。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道家诸子,包括《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文子》、《蜎子》、《关尹子》、《老成子》、《长卢子》、《王狄子》、《公子牟》、《田子》、《老莱子》、《黔娄子》、《官孙子》、《鶡冠子》、《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孙子》、《捷子》、《曹羽》、《郎中嬰齐》、《君臣子》、《郑长者》、《楚子》、《道家言》等等,还有《隋志》中补录的《守白论》、《任子道论》、《唐子》、《杜氏幽求新书》、《抱朴子》、《符子》、《夷夏论》、《简文谈疏》、《无名子》、《玄子》、《游玄桂林》、《广成子》等等。

这一部分内容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是它将与上一部分黄老之学的内容交叉重叠;二是大部分图书早已亡佚,后来辑佚的或者后出的,要仔细考辨;三是新出土的简帛,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的帛书“黄帝四篇”等,有可能即为原来的《黄帝四经》等著作。与此同时,新出土的资料中完全可能有一些原来没有著录过的内容,那就需要加以探究和归类。

第四,道教研究,包括道教历史、道教经典、道教思想等的研究。道教史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正确理解现在和更好地展望未来。道教经典很多,也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部五千余卷的《道藏》就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大矿。道教思想可以从多方面展开研究,道教信仰、道教戒律的研究都将很有意义,道教醮仪和法术、符箓的研究对道教的发展也是重要的。道教文化的研究、道学研究理应包括这些内容。

以上所作简要的概括,应该不会有大的偏差,重要的是今后我们如何实行,望有志于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有志于道学研究的同道,共同努

力,弘扬和发展道家道教的道文化。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愿为促进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作自己的一些努力。

本中心是2002年成立的,但有较长时期的历史渊源。1982年,几乎是同时,我的老师张舜徽先生发表《周秦道论发微》、詹剑峰先生发表《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本人也在80年代初开始了秦汉道家思想的学习和研究,直至1984年出版《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而与我同辈的刘守华教授1983年开始发表《道教与中国民间故事传统》、《中国民间故事的道教色彩》等论文,引起了道教文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后来更写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专著。此后我们日益广泛地与道教文化的研究者以及道教界人士联系。我曾经在《秦汉新道家》一书的前言中说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道家道教文化研究到处呼吁的陈鼓应先生,他先是奔走各地广泛与有关的研究者联络,同时在香港青松观侯宝垣道长的支持下,筹备出版有关刊物和准备召开学术讨论会议,1992年《道家文化研究》开始出版,1993年在四川成都召开了第一次大型的道家道教文化学术讨论会,一下子把海内外的中外学者聚集起来,展开道家道教文化的研讨,大大促进了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与此同时,各地、各界、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越来越多。从事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者(包括专门的和兼及研究的)彼此都日益熟悉、交往起来,而研究的内容也日益丰富、深入。还值得一提的是,彼此交往之中,还有中国道协 and 各地宫观的许多道长,他们也举行过多次道教文化研讨会,邀请学者参加,互相切磋,并采取多种形式合作共同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我们开头所说的“方兴未艾”即就此发展情况而言。

2002年11月2日,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得到了黄胜得、陈鼓应、王博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并远道而来亲临成立大会。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此得以更为有序地展开。利用我们与学校历史文化学院的隶属关系,我们在专门史学科内设立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方向,招收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开辟了“道家道教文化”专栏,继续深入老学、庄学的研究,逐步地兼及道家道教文化的其他

方面的研究等等。过去我们曾参加过一些合作项目,如“中华道藏”的整理工作,今后也将继续寻求各种合作。2005年,我们与江苏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商定,共同主办出版一个“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也就是丛书),使得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成果多一个发表园地。为学如积薪,我们的工作也是想为学术得以传承而添薪增火。此事得到了茅山道院和杨世华道长的大力支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社长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并且为这个书系精心设计,周密安排,从而在2006年伊始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希望这个书系能够坚持下去。

希望在日后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它自己的特色。

大家共同努力,主办者、作者、编辑出版者、关心支持者共同努力,以上希望是能够实现的。

熊铁基

2006年元旦

题 辞

修志就是修史，史志一体但又各有所侧重，大凡记一方沿革、古迹、人物、风俗的书，叫做志书或者方志，如县志、府志之类，以名山为中心者称为山志，以宫观为中心者称为宫观志。志书的价值和意义与史书完全一样，既是记事存迹，也是述遗以为鉴。

过去的许多山志，都与道教宫观有关，总记一山的宫观与道教活动，如《龙虎山志》、《齐云山志》、《武夷山志》、《茅山志》等等。《茅山志》就是其中最有名最重要的一种。传世有元代刘大彬和清康熙时笪蟾光编纂的两种，名为山志，实际上主要记述道教茅山派的发展，是一部道教史志书，应正名如本书的《茅山道教志》。

本书与过去的《茅山志》不同，对茅山的历史沿革，神仙、真人、宗师等人、神，道经志书，以及宫观和科仪等等，进行了重新梳理，既利用了原来志书的资料，又有许多新的补充，全书后半部分的内容，搜集和整理的新资料更多，完全是清代以来最新最完整的一部茅山道教志书。

茅山在道教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被称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茅山原名句曲山，因三茅真君于此得道成仙而名为茅山。道教兴起之后，历代都有著名仙真在茅山修道的事迹，如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李含光等等，的确是真仙高士层出，有的还创宗立派，在道教发展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再加上茅山“又近在寰中，为名儒硕彦所必游之地”，因此，“非若他山之僻处一隅、人迹之所罕到、仙灵之所不继者，所可同日而语也”（《成化朝重刻茅山志序》）。如此仙灵福地，岂能不续修其志书，真所谓“可有而不可无，可完不可缺”也。茅山道教的后继人杨世华道长，立志续修此志，并与潘一德道长共同完成此事，功德无量。

此志收入本“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这对书系特色的形成，又有进一步的充实。

熊铁基

2007.8.8

1